

# 维护和平的 排雷车

Simon Willson

对达龙·阿塞莫格鲁的采访

在监狱的一夜第一次让达龙·阿塞莫格鲁体会到监管对于市场体系的重要性。年少时的阿塞莫格鲁曾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和别人一起无证学车，地点是一条废弃的高速公路，这里通常被他们这样的驾驶者用于练习。一天当地警察决定进行干预。一场突如其来的搜捕将阿塞莫格鲁和其他驾驶者抓到市中心的牢房里，第二天早上他们遭到严厉斥责。

“没有监管和可遇见的法律，市场无法运营”，阿塞莫格鲁悔悟道，如今他是已从懵懂少年成长为麻省理工学院（MIT）应用经济学的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讲席教授。几个小时面对班房水泥墙的经历以及随后的行政惩处使他从此认识到公正裁决的规则的重要性，即便是在明显的自由市场中这也不可或缺。

“世界上每个单一市场都受到监管，只是程度有所不同”，透过办公室眺望窗外冰冻的查尔斯河（流经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阴沉萧瑟的远景，阿塞莫格鲁这样说道。“只要有法官执行法律，就构成监管。这在发展中经济体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些经济体的市场并没有精确地运作，因为其缺失必要的监管和制度。政府通常阻碍了市场的运作，但倘若你真的需要市场有效运作，就需要政府对其进行支持，具体方式包括法律和



秩序、监管，以及公共服务。”

## 早期经历

阿塞莫格鲁年少时所经历的法律执行程序帮助他规划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目前他侧重于研究为何某些国家成功地成为财富和满足感的可行的发动机，而其他国家却失败了，并且持续遭遇失败。探究这一领域的迂回路线引导着这位出生在伊斯坦布尔的经济学家从原先的一名政治学学生将研究扩大到了经济学，并且最终完全放弃了政治学。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英国北部的约克大学念书时，阿塞莫格鲁主要集中于宏观经济学，但他逐渐发现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趋势起源于微观经济学。“如果想充分理解更广阔的宏观图景——经济增长、政治经济学、长期问题——你就必须理解基本的微观原理，例如激励、资源配置、技术变革，以及资本积累。”

对经济学两个主要学科的重叠和相互影响的认识与论述使阿塞莫格鲁成为一个非凡的通才，这使他打破了旧有的界限。“我做的许多工作属于政治经济理论，其中绝大多数是博弈论的基本应用，所以你可以说它属于微观，但我的研究是源于更宏观的问题，所以当然也属于宏观经济学。”

从约克大学毕业后，阿塞莫格鲁在伦敦经济学院（LSE）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在那里他迎来了转折点——他遇到了自己的长期合作者詹姆斯·罗宾逊，后者现在是哈佛大学的政府学教授。当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开始交谈时，事情很快取得进展。“我们一致认为催生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民主”，阿塞莫格鲁回忆道，“但当时并没有关于民主从何而来的模型，政治学文献也无法提供帮助，所以我们从1995年开始将其作为研究主题，并一直延续至今”。

罗宾逊现在还记得，在LSE研讨会的参与者中，有个衣服皱巴巴的、不停指手画脚的身影从第一排站出来大声质疑他的方法论。“1992年初我在一个研讨会上展示我的研究成果，当时我正对面有个着着实烦人的博士生，他不停地打断我，并且在我演讲的过程中发现错误。之后我们中的一群人出去吃饭，而我最后坐下来发现旁边又是那个令人不快的家伙，但接下来开始聊天时，我才发现他有一些原创的思想，而且进展得很好。这就是达龙。”

在那时，阿塞莫格鲁似乎正在系统性地与他未来的研究合作者进行争辩，因为其另一位未来的合作者，LSE的经济学教授史蒂夫·皮施克记得自己曾受到过同样的对待。“我曾于1991年在LSE进行研讨会

发言，这个讨厌的研究生就在前排询问我的方法并要求得到更多信息”，皮施克回忆道，“达龙甚至在我们之后出去吃饭时还在询问。”

## 共同开展研究

从1993年初起，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那时在澳大利亚任教）通过一个新奇的通信媒介就研究课题交换意见。“那是我第一次使用电子邮件”，罗宾逊回忆说，“我们最开始通过电子邮件交换各自的论文，然后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已经各自独立地写了两篇关于相同主题的论文。”真正的经济学家对重复和低效深恶痛绝，两位学者开始共同开展他们的研究。

那时他和罗宾逊的研究已经迈向更高台阶，阿塞莫格鲁已经转向了“我的第一份真正的工作”，他于1993年成为MIT助理教授。不久他特有的对本专业已有界限的不加掩饰的漠视在查尔斯河沿岸走廊引起轰动。得益于罗宾逊所注入的原创思想，阿塞莫格鲁继续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发展结合微观和宏观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在伦敦时他已为该领域打下基础。

“当我准备在MIT晋升时，老一辈的同事说我的大多数研究优秀而有趣，并有着良好反馈。但他们还说：‘你真的应停止目前在政治经济学上的研究’。所以接下来的两年中我隐藏了部分工作，直到获得终身教职。”1998年阿塞莫格鲁拿到了MIT的终身教职，而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已经几乎成为主流。

在MIT站稳脚跟后，阿塞莫格鲁于2005年荣获美国经济学会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该奖项颁发给40

## 自满文化的观念

阿塞莫格鲁与其他学院派经济学家对那些专业人士进行了审视（阿塞莫格鲁，2009年），以找出其在预测和处理始于2008年初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过程中出现的智力错误。他相信三种观念尤为扼杀了任何忧患意识。

第一是认为商业周期已经被精明的决策和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创新所征服。事实上，这两股变革力量已经将经济的内部联系增至一个临界点，一旦超过就会产生跨金融机构、公司和家庭的潜在多米诺牌效应。

第二，市场的制度基础已经被遗忘，而自由市场被等同为不受监管的市场。现在可能没有人还会认为市场监控是充分的，足以防止不受监管、追逐利润的个体通过承担风险、在令他人损失的同时获利的机会主义行为。

第三，长寿的大型组织的声誉资本被高估，尽管新千年之初安然和世通公司的会计丑闻已经对此进行了预警。对此类组织自我监控能力的信任已经使人们遭受致命打击，而未来对违规行为的惩罚需要严厉而可信。

岁以下最具影响力的美国经济学家。他与罗宾逊（当时在伯克利任教，现在在哈佛）合著的《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于2006年出版。“我当时对欠发达问题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开始阅读致力于“依附理论”研究的作者的著作，该理论是阐述世界是如何产生贫富现象的，这是因为穷人受到富人的剥削。我还着迷于寻找土耳其贫穷和不民主的原因。”

在《专制和民主》一书中，阿塞莫格鲁与罗宾逊开始了他们至今仍在继续的研究。他们追问为何某些国家非常民主——这些国家有着定期的自由选举，且政治家们对公民负责——而另一些国家则不然。他们调查了是什么因素决定一国是否为民主国家，以及为何有些国家的民主得到持续和巩固，而在另一些国家却在此遭遇失败。但是，鉴于阿塞莫格鲁自己的职业路径，这本书从经济而非政治的角度解释了民主，并强调单个的经济激励决定了政治立场。

该书还强调了政治领域中冲突的根本重要性，以

## 电影咒语

在对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成因和解决办法进行总结时，阿塞莫格鲁从一部著名电影的剧本那里找到了呼应和调整路线。在1987年奥利弗·斯通的电影《华尔街》中，迈克尔·道格拉斯扮演的金融大亨盖葛有一句著名的台词：“贪欲是好的，是正确的，贪欲正发挥作用，贪欲澄清了、打破和抓住了改革的本质，贪欲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贪图生活、金钱、爱情，还有，还有知识，并且记录了人类前进的步伐。”

在对全球危机的早期分析中（阿塞莫格鲁，2009年），他这样说道：“经济学原理深刻而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洞见到抽象中贪婪既不好也不坏。当涉及在良好的法律和监管下的竞争、创新行为和利润最大化时，贪婪可以作为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动力。但若没有合适的制度和监管进行约束，贪婪将堕落为寻租、腐败和犯罪。”

阿塞莫格鲁曾看过这部电影，并且在他起草关于贪婪的文章时回忆起了盖葛的独白。“每个人都对激励有所反应。对绝大多数人而言，野心和贪婪之间存在承接关系，制度在这其中发挥作用。制度可以通过其职能阻止市场走向极端如对垄断进行监管，从而使其不击垮竞争对手。贪婪只在其引导向坏事时才是不好的。制度可以将贪婪引向卓越。”

但他警告说，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将银行家和金融家的贪婪引向发挥积极作用的制度已不再适用。“我们（经济学者）提供建议，决策者颁布法律——拆除了使原有制度运作的体系，却又不任用任何一种对金融行业行为的制衡来取代它。这就是为何贪婪会起负面作用。”

及经济领域中竞争所起到的作用。不同的社会团体或社会阶层将利益置于政治成果之上（通常采取寻租的方式）。这些对立的利益以政治制度的形式转化成了根深蒂固的冲突，而这决定了政治成果。

合著此书的经历使得罗宾逊对阿塞莫格鲁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有了新的认识。“我们能通过其专业和研究重点描述大多数经济学家。但他无法归类——他无所不及，而且有一个无所不包的模型。我不知道他哪来这么多能量研究所有他关注的领域。他持续保持旺盛的进取心。”所有的这些激情和动力是否能以更平静的方式呈现？罗宾逊坦言：“达龙可能会痴迷于让所有细节变得正确。”

曾经有一次，他们早期合作的论文已被提交给一本期刊，并收到了回复的邮件。当时两人正挤在罗宾逊位于洛杉矶的办公室内，点开邮件一看，是拒信。

“看到审阅人例行公事的报告，我真的非常沮丧和压抑，当时我坐在那里望着窗外，不知将何去何从”，罗宾逊回忆道，“等我转过身来，发现达龙已在废纸上升笔疾书代数式了。他当时对此的反应是：‘我来重新做模型，我们要把论文发到别的地方’”。

## 宝贵的思索

通过一系列的期刊论文，阿塞莫格鲁对民主的经济起源进行了颇具价值的反思，这些论文汇聚成了他的第二本书（阿塞莫格鲁，2008年），该书聚焦于民主产生的时机和发生率。这本名为《现代经济增长导论》的教材超过1000页，以他在MIT所教授的课程为基础。该书比他的第一部著作中提出的“为什么要民主”更进一步，深入探讨了“何时民主”。再一次地，阿塞莫格鲁发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学原理。

“我们在实证上做了很多工作，它们表明了大量的经济制度间清晰的因果关系——鼓励社会各个阶层的广泛参与、落实产权、防止征用没收与经济增长密不可分”，阿塞莫格鲁断言，“增长和民主政治制度之间的联系则没有那么明晰。”

这本教材表明，政策和制度对了解跨期增长过程而言至关重要。接下来该书基于这种理论基础解释了两个关于“何时民主”的关键问题：为什么1800年以前世界经济没有经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为什么1800年前后世界经济开始腾飞，且主要发生在西欧？

该书声称1800年之前没有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第一条理由是因为在这之前没有一个社会曾投资于人力资本，从而使得新企业能带来新技术，并且普遍释放出“创造性毁灭”的威力，第二条理由是1800年之前所有的社会都处在专制的政治制度之下。而经济腾飞始于西欧是因为在发现新大陆、开辟海上新航线之

后，国际贸易额不断攀升。贸易的上扬带动了商业活动，并使得新的批发商、贸易商和工业家群体拥有了更多的经济和政治力量。这些人之后摆脱了欧洲君主的限制，开始独立运营。

阿塞莫格鲁承认，专制政权也可能带来经济增长，但他坚称这是不可持续的。“在古罗马，这种增长断断续续保持300—400年，虽说这个时间不算短，但之后的经济增长大幅放缓。但这种专制下的增长将受到三种制约：这些制度总会受到变得更加专制的激励；这些制度往往利用手中的权力阻止熊彼得所说的“创造性毁灭”，而这是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总是存在为了争夺专制控制权的内讧，这导致了不稳定和不确定性。”

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已经着手准备他们的下一本书《为什么联合国遭遇失败？》，承接他们第一本书中“为什么民主”和及其教科书中“何时民主”的问题，第三本书可以被非正式地看做是三部曲的终结篇，它很可能会问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民主会怎样？”

“功能失调的社会将退化为失败的国家”，阿塞莫格鲁如此断言，“但我们是能够采取一些措施的。”

### 解铃还须系铃人

阿塞莫格鲁认为用于解决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政策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其可能已经为未来的危机埋下祸根。“这些解决现有问题的政策是否为下一次危机创造了条件？在我看来，这并非是虚幻的风险。”

“一旦危机消退，我们将回到老路上来，而不会做任何事情。此次危机前，美国有20个左右的银行在GDP中占有很大比例，其在企业总利润和金融部门雇员总薪酬中的比重甚至更高。现在我们只有5到6个机构扮演此种角色，因此这是一个更加垄断的体系。美国金融机构看到解决本次危机的政策背后的明确含义是：‘你太大而不能倒’。好的，现在是‘太大而不能倒的平方’了。”

“它们预期美国政府有意愿并且有政治支持以各种方式救助它们。如果你现在是一家大银行的主席，而且对股东有利润最大化的受托责任，那么你的职责就是在当前监管环境下最大限度地利用政府可能给予的一切。”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有好的监管，则银行的董事会主席对股东的受托责任就将是通过更好的金融中介实现利润最大化，而非通过更多的自营交易——银行代表自身而不是客户进行交易。如果美国经济相当比例的利润是通过自营交易而非金融中介或合并与收购获得的话，那么将很难见到有效分配资源的资本主义体系。”

我们可以建立基础设施完善、法律健全、秩序井然的政府，从而便利民众，使其有信心经商或依靠公共服务。但是，政府没有任何政治意愿想要做到这一点。你不会需要军队来实施这种计划——一个仅仅设定市场体制基础的正常运作的官僚政府。”

### 奖励结构

阿塞莫格鲁对失败政府的解读将致力于说明为何某些国家实现了经济腾飞，而有些国家则不然。这将部分牵涉到阐释政策和制度如何对社会能否实现现代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这些政策和制度将决定社会的奖励结构，投资是否有利可图，合同的执行，法律和秩序，以及基础设施；还有市场的形成，有效率实体是否能够取代无效率实体，以及社会对新科技的开放性（这可能会侵犯到政治上的相关任职者的利益）。

这些结论可能将使我们重新审视《专制和民主》中的一组对比，即参与制下促进增长的制度集合与专制下阻碍增长的制度间的对比。

阿塞莫格鲁在MIT的办公室紧挨着前厅，里面堆满了摇摇欲坠的杂志、期刊、参考书和卷着毛边的手稿，是怎样的雄心支撑着他在如此的环境中进行着热情洋溢、兼收并蓄而且前景不可限量的学术研究？从个人的角度讲，阿塞莫格鲁的妻子阿苏正在期待夫妻二人第一个孩子于2010年5月的降生，“所以我最大的志向就是成为一个称职的父亲”。在勾画他的主要学术目标时，阿塞莫格鲁将他的多重学术兴趣置于更广阔的领域中。“我们有必要开展更多跨学科对话和关于社会科学重要问题的广泛讨论。在美国，公共知识分子被视为失败者，但英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却投身于国民对话之中。我希望能够看到这种场景，并且能够参与其中。”

但回到土耳其并不是阿塞莫格鲁的近期计划。

“我不能回去，因为我没有服兵役。如果我回去就会被逮捕。”那样做的惩罚是：回到监狱。■

Simon Willson是《金融与发展》的高级编辑。

### 参考文献：

Acemoglu, Daron, 2008,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Growth*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09, “The Crisis of 2008: Structural Lessons for and from Economics,” *CEPR Policy Insight No. 28* (London: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 and James Robinson, 2006,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